

· 读史札记 ·

辛亥鼎革之际“民军”称谓考略^{*}

——兼论清帝逊位诏书的性质

朱文亮

内容提要 辛亥革命初期,“民军”实际并非革命党军队主要称谓。上海光复之后《民立报》、《申报》迅速以“民军”取代之之前使用最广的“革军”,其中《申报》政治转向尤为明显,暗含对新成立的上海军政分府及其宣称的“中华民国军政府”之承认。伍廷芳被推举为民军议和总代表后,“民军”才正式成为各地革命党军队统一名称。1912年元旦中华民国成立,“民军”又成了民国军队的统称,其政治意蕴值得关注。南北议和时期“民军”屡次出现于清方文献,其意义在清帝逊位诏书中得到充分体现。研究“民军”有助于加深我们对清帝逊位诏书性质的认识。

关键词 辛亥革命 民军 革军 清帝逊位诏书

在有关辛亥革命的叙述中,“民军”这一称谓屡见不鲜,一般认为是泛指革命党方面的军队。^①与之类似的还有“革命军”、“革军”、“国民军”、“民国军”、“南军”、“党军”等称呼。其中“革军”明显是“革命军”的简称,相较“民军”而言,此称谓似乎更能代表革命党方面的军队。然而,“民军”与“革军”、“革命军”往往同时出现于同时期的一些报刊中,出现频率甚至大幅超过“革军”与“革命军”。^②每一新词的出现,必有其特定历史原因,尤其在辛亥鼎革这一特殊历史时期,民军这一新称谓逐渐频繁出现于公私文档,其原因及意义或可深思。对于这一现象,学界以往关注较少,本文试就辛亥民军称谓的演进及意义进行一些探讨。

* 本文撰写曾得到张海鹏研究员悉心指导。匿名审稿专家提供了宝贵意见。初稿在近代史研究所第42期青年读书会报告时,又承蒙与会师友精彩建议。谨此致谢。文责自负。

① 参见邱捷《民军问题与辛亥革命时期的广东社会》,《学术研究》2009年第3期,第106页;韩真《福建民军性质问题当议》,《闽江学院学报》2003年第1期,第123页。

② 检索“中国近代报刊数据库”《申报》电子版可知,《申报》最早有关辛亥革命“民军”称谓是在1911年11月3日,该日至1912年2月12日有关民军的新闻约1126笔,革命军90笔,革军87笔(与革命军重复的有9笔)。网址为 <http://www.dhcdh.com.tw/SP/>。

武昌起义之前,革命党人并未将“民军”作为自己起义军队的名称,即便在辛亥革命初期,革命党军队的正式称谓也未统一。

“革命党”称谓亦不为中国所固有。“在清季乙未(清光绪二十一年)年兴中会失败以前,中国革命党人向未采用‘革命’二字为名称。从太平天国以至兴中会,党人均沿用‘造反’或‘起义’、‘光复’等名词。及乙未九月兴中会在广州失败,孙总理、陈少白、郑弼臣三人自香港东渡日本,舟过神户时,三人登岸购得日本报纸,中有新闻一则,题曰支那革命党首领孙逸仙抵日。总理语少白曰,‘革命’二字出于易经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一语,日人称吾党为革命党,意义甚佳,吾党以后即称革命党可也。”^①但惠州起义时,革命党仍以“反清复明”之类口号为主,“旗帜伪书大秦国及日月等悖逆字样”。^②

1905年,孙中山联合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成立中国同盟会,确立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十六字纲领,并在1906年秋冬制定了指导革命的重要文件《革命方略》。《革命方略》包括《军政府宣言》等11个文件,其中的固定格式就有“×年×月×日,中华国民军×军都督××奉军政府命”字样,《军政府与各处国民军之关系》、《对外宣言》中也明确革命军队的名称为“中华国民军”。^③同年12月4日,同盟会会员刘道一、蔡绍南联合会党领袖龚春台、姜守旦发动了萍浏醴起义。有关奏折对此有较为详细的描述:“适有游学日本暑假回籍之蔡绍南,乘间以革命演说,李经其等遂假以为名,自称为革命军”;“号衣书革命军先锋,后营军,前营等字样,旗书革命军及洪福齐天等字样”。^④岑春蓂致军机处代奏电也提到“起获飘布会名不一,内惟自立社一飘,并号衣革命先锋军汉勇字样,最为悖逆”。^⑤据说龚春台领导的起义军还发布了《中华国民军起义檄文》,内有“中华国民军南军革命先锋队都督龚,奉中华民国政府命”等内容,但现存资料未能充分证实,“国民军”称谓是否正式登场尚待新证。^⑥

1907年5月至1908年4月,孙中山和黄兴等人在两广和云南先后发动了六次起义,“中华国民军”的称号被起义军多次使用。“北海镇李准近得一函,系从河内某洋行寄来者约二三千言,其开首云中华国民军南军都督黄和”^⑦,“要匪黄□李□就戮,并进呈旗帜告示名册等件,旗以红布为之,上有白字曰中华国民军东路分统李……告示上有印曰总统中华国民军之印”。^⑧但“革命”一词在当时更易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与同情,据邹鲁《中国同盟会》一文所载,孙中山曾“将‘中国同

① 冯自由:《革命逸史》上册,新星出版社2009年版,第13页。这段有关“革命党”出处的叙述本源自陈少白自述,学界对此颇有争议,然而,陈少白自述虽然在具体时间上可能有记忆性错误,但对了解“革命党”起源仍有重要参考价值。参见陈建华《“革命”的现代性:中国革命话语考》,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117页。

② 陈春生:《庚子惠州起义记》,中国史学会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下文简作《辛亥革命》)(1),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42页。

③ 1908年增补的《招军章程》、《招降清朝兵勇条件》进一步称为“中华民国国民军”。参见《中国同盟会革命方略》(1906年秋冬间),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等编:《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296—318页。

④ 《江督贻抚会奏萍乡革命军起事情形折》,中国史学会编:《辛亥革命》(2),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492页。

⑤ 《光绪三十二年十月二十四日湖南巡抚岑春蓂致军机处代奏电》,中国史学会编:《辛亥革命》(2),第499—500页。

⑥ 学界曾就此檄文真伪进行争论,但似乎仍无铁证。参见王学庄、周秋光《萍浏醴会党起义檄文辨伪——兼论〈魏宗铨传〉》,《历史研究》1989年第5期;饶怀民《萍浏醴起义史料真伪问题——与〈萍浏醴会党起义檄文辨伪〉一文商榷》,《历史研究》1995年第6期。

⑦ 《钦防匪情近闻》,《申报》,1907年10月22日,第1张第3版。

⑧ 《桂抚奏报越匪肃清之内容》,《申报》,1908年7月19日,第1张第3版。

盟会员’改为‘中华革命党党员’。因河内之役,英、法、南洋殖民政府,已承认革命党为政治团体之故。”黄花岗起义失败之后,孙中山在美洲发起革命军筹饷,其约章的落款即为“中华革命军发起人孙文立”。^①

武昌起义初期革命党多按照《革命方略》行事,其《电告汉族同胞之为满洲将士者》基本照搬《革命方略》中的《招降满洲将士布告》,明确标示出与满洲政府对立的“国民军”身份:“天运辛亥年中华国民军南军都督奉军政府命……我辈皆中国人也,今则一为中华国民军之将士,一为满洲政府之将士。”^②其《联合东南进讨满奴檄》也言称,“今此满虏羯运,既终数过时,可我国民军起义,克复武昌汉阳。只数日间,东南十数行省,同声响应,宣布独立。”^③另一方面,黄兴设在汉阳的司令部招牌名称则为“革命军总司令部”。^④虽然时在鄂州乡下养病的朱峙三曾记载,“舅父来云,传闻湖南独立,响应民军”^⑤,但在上海光复之前,湖北军政府的文件中还罕见“民军”称谓。总之,直至此时,革命党对其军队或称“革命军”,或称“国民军”,既不固定,也不统一。

二

上海由革命党主导的重要报纸《民立报》较早刊登了有关武昌起义的消息,其在辛亥革命初期的报道也较为混乱。“十九日武昌兵变闻有革党乘势起事武汉交通已断”^⑥,接着宣称“外国竟承认革命军为交战团体矣,竟为革命军守中立矣”。^⑦《民立报》最早以“民军”指代革命军则是在10月17日,“又二十二日接汉口函述二十一日汉阳失守后各情如下:革党鄂军都督于二十一日将燃灯时遣派民军一排……当由驻扎大别山之民军攻击两炮”,此文提到革命党军队时统一用为“民军”。^⑧其《武汉大风云》系列对“国民军”与“民军”的报道较有意思,10月16日的报道称,“招募青年国民军,优给粮饷,学生及平民入军者甚多”,“由汉口遥望鄂垣,国民军扼守如故”。10月17日与18日则统一说成“民军”,而10月19日起多用“国民军”,间有“革命军”字样。10月26日起不同来源消息两者夹杂使用:“汴鄂国民军亦以大队对驻,以窥进取……民军则万众一心,前者仆而后者起。”后来竟出现同一新闻中两者交替使用指代同一军队:“闻萨镇冰宣言,如三日内不能胜民军,则将长江一带降于国民军。”^⑨

《申报》在革命初期报道革命党起事多称“革党”、“革命军”:“鄂垣节前即传革党起事,初定十六日,因严防未得逞,旋改十八日,又为密探侦悉,捕获革党二十个人,起出炸药数十箱。党人知事败,十九日即约同新军仓卒起事。”^⑩“革命军今晨……围攻汉阳兵工厂,随占据之。”^⑪直至11月3日上海起义当天才有一条“民军”报道,为政治转向埋下伏笔:“官军方畏却,民军已长驱……官军

① 邹鲁:《中国同盟会》,中国史学会编:《辛亥革命》(2),第44、81页。

② 曹亚伯:《武昌起义》,中国史学会编:《辛亥革命》(5),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43页。

③ 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纪念馆、政协湖北省委员会编:《湖北军政府文献资料》,武汉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28页。

④ 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纪念馆编撰:《辛亥革命大写真》上卷,湖北美术出版社2001年版,第351页。

⑤ 《朱峙三日记》第2册,1911年10月27日,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1年影印版,第358页。

⑥ 《专电》,《民立报》,1911年10月12日,第2页。

⑦ 《社论》,《民立报》,1911年10月14日,第2页。

⑧ 《武汉革命大风云(四)》,《民立报》,1911年10月17日,第3页。

⑨ 《大革命之大风云(廿三)》,《民立报》,1911年11月1日,第3页。

⑩ 《专电》,《申报》,1911年10月12日,第1张第2版。

⑪ 《专电》,《申报》,1911年10月13日,第1张第2版。

专制,民军共和……”^①“国民军”称谓则在11月之前与“民军”一样几乎未见出现。^②

“革军”(革命军)是辛亥革命初期《民立报》、《申报》对革命党人军队最普遍的称呼,但“民军”后来居上,逐渐超越并取代了“革军”,反映了革命力量与清廷势力在上海的此长彼消。《民立报》革命性质鲜明,其专电一栏较有特色,多为醒目粗体黑字,以示重要;《申报》保守中立,见风使舵,其内容变化亦可作为当时政治动向的重要参考。两报在“革军”、“民军”两词的使用上颇有趣味。现将笔者统计的两报专电栏(含译电)中10月10日至11月29日间每日出现的“民军”与“革军”(包括革命军)次数变化趋势分别图示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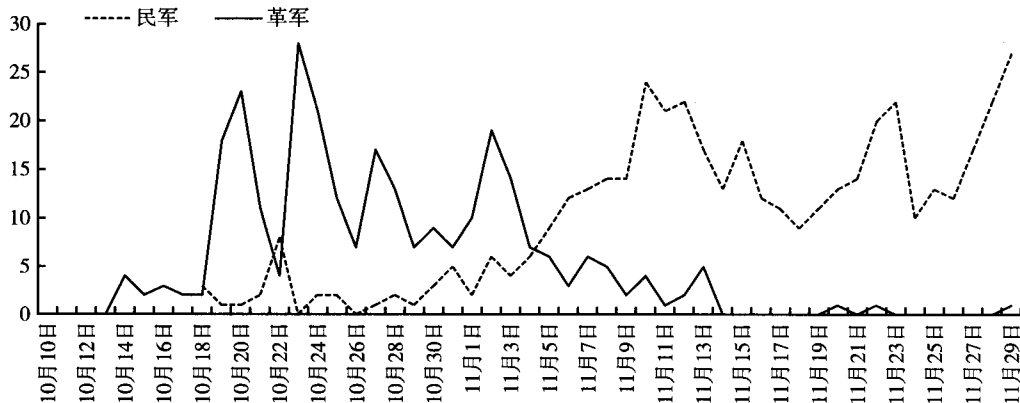


图1 《民立报》专电栏(含译电)民军、革军(革命军)次数比较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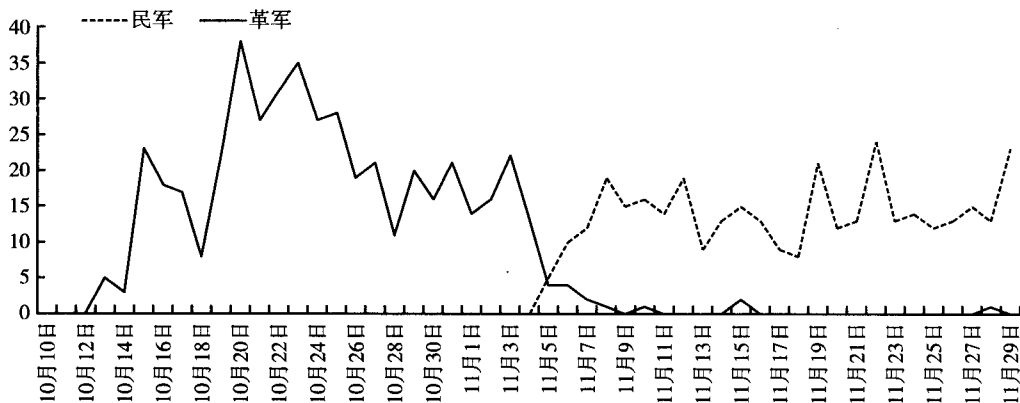


图2 《申报》专电栏(含译电)民军、革军(革命军)次数比较图

比较两图可知,11月4日是一关键,此日之后,“民军”开始全面超过“革军”,“革军”称呼多日不见报道,或报道甚少。究其原因,与此日上海完全光复关系甚大。上海光复,波及江浙,震动东南,故有人称:“时响应之最有力而影响于全国最大者,厥为上海。”^③汉口租界保守的英文《汉口日报》也因此改变立场:“自从叛乱——现在本报专栏中尊称为革命——爆发以来,一直还没有发生

① 《心直口快·官军民军之比较》,《申报》,1911年11月3日,第2张第3版。

② 《申报》电子版搜索结果。此前虽曾报道“革民军临时政府已设政事处为行政总机关”,但此“革民军”疑系“革命军”之误。参见《专电》,《申报》,1911年10月23日,第1张第3版。

③ 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等编:《孙中山全集》第6卷,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244页。

过本报昨天发布的快讯中的那种重大新闻,即上海投向了革命军。就这么一次打击,也足以使中国的事态完全改观,革命党的地位急剧上升了。”^①

图2的趋势与图1有类似之处,但政治意味尤为明显。上海光复前《申报》电文几乎从未出现“民军”称谓,而11月5日《专电》第一条即报道,“江阴炮台昨日已归民国军占领”,接着又称,“苏城戒严均言民军即日至省”。^②当天“民军”乍一出现就达5次,超过“革军”的4次,此后便遥遥领先,乃至取而代之。《申报》迅速启用“民军”,弃用“革军”,正体现“民军”与“革军”意义之不同。证明后期的“民军”已有着“革军”无法替代的重要寓意,暗含《申报》对新生的上海军政分府及其所宣称的“中华民国军政府”之承认。而且,《申报》11月4日正式报道“民军”时就将其与“民国军”约略等同:“先是三点钟有民国军二百余人排队过沪军营……未几营中即扯民国军旗。民国军既至制造局……旋由民军向众演说。”第二天仍有相似报道:“前晚十点钟民国军约有一百二十余人荷枪列队拥至道署……现道县署均有民军驻扎防守。”^③初步统计《申报》电子版检索,11月份将“民军”与“民国军”混合使用达31条。

三

上海光复之后,“民军”在沪军都督府文献资料中多有出现。上海军政府安民牌示即称“民军到处,秋毫无犯”;陈其美就伍廷芳担负外交一事通电各省都督文开篇亦言,“民军倡议伊始,百凡待举”。^④南北议和时期,伍廷芳被推举为南方代表,黎元洪曾有电文致伍:“十一省公推先生为民军代表,与之谈判,此举关系甚巨”;伍廷芳复电:“辱承十一省公推廷芳为民国代表,谊不敢辞。”^⑤自此,“民军”已成各地革命党军队统一的正式名称,并与各地革命党人为之奋斗的“民国”紧密相关。有意思的是,革命者在《革命方略》中的本意是以“国民军”作为民国军队之称谓,却戏剧性地为“民军”一词所吸收替代。其缘由或难深究,其结果却有事实可证。随着革命势力不断扩展,民国初具雏形,“民军”影响越来越大,1912年元旦中华民国正式成立,“民军”自然正式成为民国军队的统称,在“民军”称谓之下实已隐含非同一般的政治意蕴。

正因为“民军”隐含着与“民国军队”、“民国政府”相关的政治意蕴,清政府对“民军”用词一直谨慎。在革命初起之时,清方多称革命方为“革匪”、“革党”:“革匪余党勾结工程营辎重营,突于十九夜八(点)钟响应”,“顷据瑞澂电奏,现驻湖北工程营辎重营勾结革党为乱”。^⑥又如:“宣统革命军起于武昌,旬月之间,各省风靡……乃往谒醇邸,告以此次之变,总宜镇定,切不可张皇畏惧,尤不可认彼为革命之军,恐友邦认其为第三国交战例,则不可收拾。”^⑦南北议和时期,“民军”开始在清方文献中屡次出现,表明清廷对“民军”及其所代表的“民国”逐渐接受。

汉阳被占后,在英使领调停之下,12月1日订立了《南北两军停战三日公文》,此可视为南北议和之先声。其中“民军应守之条款”即规定,“甲、民军于停战范围日期内一律按兵不动。乙、民军

① 英文《汉口日报》编辑,万小楠译:《革命日记(连载之四)》,《辛亥革命史丛刊》第8辑,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205页。

② 《专电》,《申报》,1911年11月5日,第1张第5版。

③ 《占领道县署详情》,《申报》,1911年11月5日,第1张第3版。

④ 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选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92、312页。

⑤ 《湖北军政府文献资料汇编》,第128页。

⑥ 《宣统政纪》第61卷,宣统三年八月下,《清实录》第60册,中华书局1987年影印版,第1095、1096页。

⑦ 溥伟:《让国御前会议日记》,中国史学会编:《辛亥革命》(8),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10页。

之兵船于停战范围日期内不得行驶。”^①在清方第一军总统冯国璋“请英使速补公函为据”的要求之下,第二天便“接到英使停战公函,并签有字据”^②,冯遂致电内阁上报。12月7日,冯又接到“英领交来黎所要求两条”:“一、停战三日满,续停战十五日,期内,全国清军民军均按兵不动,各守其已领之土地;二、清总理大臣派唐绍仪为代表,与黎大都督或其代表人讨论大局。”冯在致内阁电文中尽管顾虑“第一条内虽有全国民军字样,而黎之代表告英领,彼亦不能命令秦晋”^③,但对于条文中与“清军”相对应的“民军”称谓却未表异议。有关清军态度的转变,当时旅居武汉的日本人亦有所察觉:“从来清军称革命军为叛军,但最近在冯国璋公文中改称民军,称黎元洪为黎军门或黎大都督,可以推测一切了。”^④

清廷官方对南北议和正式表态也是在12月7日,这一天的谕旨称:“著袁世凯为全权大臣,由该大臣委托代表人驰赴南方,切实讨论,以定大局。”^⑤“议和”本身就包含对“民军”的承认,拥清人士亦曾这样认识:“夫‘议和’二字,乃敌国相待之礼”;“彼革党叛匪耳,总理巧取上旨,与为议和,待之以敌国之礼,蔑视纲常,损辱国体,于斯为甚”。^⑥于是,袁世凯在12月9日致尚未独立各省督抚与将军的电文中对“民军”也不再忌讳;对于“黎要求全国停战”,“阁诘以能否节制全国民军”;并对“民军资格”有所认定:“奸杀焚掠,是为土匪,无民军资格”,将“民军”与“土匪”加以区别,不再以“匪”相称。袁还要求各属“如民军不肯接洽停战,我军仍照旧进攻。倘民军先来扑攻,须竭力抵御。”^⑦如能认为当时的内阁具备政府功用的话,可以说“民军”自此以后得到了清政府的正式承认。

南北和谈代表会议于12月18日在上海正式开始。会议首日,民军议和总代表伍廷芳就致电袁世凯,表明“民军之起,在改政体以救国民”,对于民军被“妄以土匪污损名誉”,“群情颇愤”,认为“土匪二字,清廷以诬民军久矣”,并对“询北方民军共有几处?系何姓名?能否确守命令?”一节进行回应:“现在北方宣告独立民军首领姓名,各报皆经宣布,尊处可以查知”;“凡电报可通地方,皆能受民国政府之命令”。^⑧这是向清廷正式明确民军身份为“受民国政府之命令”的军队。在接下来的和谈里,双方经过几次磋商,终于在12月30日就召开国民会议决定国体问题达成初步协议。

实际上清廷12月28日的谕旨就已对与“民军代表”谈判的这一结果有所表示:“于君主立宪共和立宪二者以何为宜……自应召集临时国会,付之公决,兹据国务大臣等奏请召集近支王公会议,面加询问皆无异词,著内阁即以此意电令唐绍怡转告民军代表。”^⑨这可以算是清廷对“民军”的首次正式承认。1912年2月3日,清廷就退位优礼等条件又发谕旨,“著授袁世凯以全权,研究一切办法,先行迅速与民军商酌条件,奏明请旨”。^⑩清廷最终在1912年2月12日颁布清帝逊位诏书,至此,“民军”称谓的政治意义在清方最高文件中得到充分认可,当天谕旨中使用“民军”一词共达到5次之多。

① 《湖北军政府文献资料汇编》,第126页。

② 《宣统三年十月十三日第一军总统冯国璋致内阁电》,中国史学会编:《辛亥革命》(8),第197页。

③ 《宣统三年十月十七日第一军总统冯国璋致内阁电》,中国史学会编:《辛亥革命》(8),第200页。

④ [日]内田顾一著,周树嘉译:《湖北革命见闻日记》(1911年12月10日),《辛亥革命史丛刊》第3辑,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85页。

⑤ 《宣统三年十月十七日旨》,中国史学会编:《辛亥革命》(8),第200页。

⑥ 吉迪整理:《大树堂来鸿集》,《近代史资料》总第50号,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83页。

⑦ 《宣统政纪》第66卷,宣统三年十月下,《清实录》第60册,第1226页。

⑧ 《宣统三年十月二十八日上海民军议和总代表伍廷芳致袁世凯电》,中国史学会编:《辛亥革命》(8),第212—213页。

⑨ 《宣统政纪》第67卷,宣统三年十一月上,《清实录》第60册,第1241页。“唐绍怡”即唐绍仪。

⑩ 《宣统政纪》第70卷,宣统三年十二月下,《清实录》第60册,第1286页。

四

理解“民军”的政治意义有助于我们加深对清帝逊位诏书性质的认识。清帝逊位诏书事关清朝最终命运,“隆裕对诏书的内容和字句都很用心,每次研究都要细读斟酌字句”。^① 逊位诏书不是清廷单方面的善意决定,而是在革命风潮不可逆转,共和民军声威日壮之时,清廷最高当局谋求自身最大利益的、别无选择的结果。

一般认为,清帝逊位诏书是由1912年2月12日清帝同一天所颁布的三道诏书及“三大优礼条件”组成,其主体内容在第一道诏书中已基本得以体现,原文如下:

朕钦奉隆裕太后懿旨:前因民军起事,各省响应,九夏沸腾,生灵涂炭,特命袁世凯遣员与民军代表讨论大局,议开国会,公决政体。两月以来,尚无确当办法,南北睽隔,彼此相指,商辍于途,士露于野,徒以国体一日不决,故民生一日不安。今全国人民心理多倾向共和,南中各省既倡议于前;北方诸将亦主张于后,人心所向,天命可知,予亦何忍因一姓之尊荣,拂兆民之好恶。用是外观大势,内审舆情,特率皇帝将统治权公之全国,定为共和立宪国体。近慰海内厌乱望治之心,远协古圣天下为公之义。袁世凯前经资政院选举为总理大臣,当兹新旧代谢之际,宣布南北统一之方,即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共和政府,与民军协商统一办法,总期人民安堵,海宇乂安,仍合汉满蒙回藏五族完全领土为一大中华民国,予与皇帝得以退处宽闲,优游岁月,长受国民之优礼,亲见郅治之告成,岂不懿欤!钦此。^②

此诏书中“民军”直接出现有三处,这三处“民军”基本概括了辛亥革命主要过程。“前因民军起事”指的是武昌起义,自此“各省响应,九夏沸腾”;而“特命袁世凯遣员与民军代表讨论大局”,指的是双方代表伍廷芳与唐绍仪在上海所进行的南北议和;“即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共和政府,与民军协商统一办法”则明确了辛亥革命的最终解决方式。有学者仅凭诏书中“即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共和政府”一句,便认为“袁氏临时政府的合法性来自清帝的‘禅让’”,未免有失偏颇,它不仅忽视了此诏书中各方字斟句酌的三处“民军”的内在力量,更忽视了另一隐含着的“民军”的深刻政治内涵。正如前文所析,到了革命后期,“民军”代表民国基本已成南北双方之共识,即便袁世凯将原稿“即由袁世凯以全权与民军组织临时共和政府,协商统一办法”改成“即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共和政府,与民军协商统一办法”^③,但终究还是得与“民军”所代表的“民国”“协商统一办法”,最终目的仍须“为一大中华民国”。也有学者仅将诏书所述“大中华民国”中的“大”理解为大小之“大”,从而认为:“‘大中华民国’背后的潜台词是‘小中华民国’,就是孙中山在《临时大总统宣言书》中宣告建立的那个中华民国”,“大中华民国仅仅是对小中华民国领土和人口的扩张,无关乎国体问题,也无关乎正当性问题,因此袁世凯这个小动作也就无关乎大局”。^④ 此论似乎欠妥,因为“大中华民国”并非清帝逊位诏书首创,《盛京时报》早在1912年1月24日的论说《论今后我民之天职》中就有过如此表述:“临时政府宣言,谓将合五大民族,组织一大中华民国,则固利用民意

① 唐在礼:《辛亥前后我所亲历的大事》,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辛亥革命回忆录》第6集,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338页。

② 《宣统政纪》第70卷,宣统三年十二月下,《清实录》第60册,第1293页。

③ 参见骆宝善、刘路生编《袁世凯全集》第19册,河南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545页。

④ 翟志勇:《透过〈临时大总统宣言书〉看清帝〈逊位诏书〉》,《环球法律评论》2011年第5期,第64页。

之所在,而为中国莫安计也。”^①而且“大中华民国”之“大”与“大清”之“大”并无区别,只是一种对国号的尊称。近代以来清政府与外国所签订的条约中,在双方的国名前加一“大”字实际已成惯例,即便是对南美秘鲁这样并不发达的小国亦是如此,如1874年李鸿章与秘鲁专使葛尔西耶为华工问题所签订的《会议专条》对双方代表的称谓即为“大清国钦差全权大臣太子太保武英殿大学士兵部尚书直隶总督一等肃毅伯李;大秘国钦差大臣水师总兵葛尔西耶。”^②

“辛亥革命的最大意义在于,革命的发生动摇了中国人两千多年来对君主专制制度——皇权统治的崇拜,用武装起义的方式掀倒了皇帝的宝座……它不是以拥立新皇帝为目的,而是推倒任何皇帝;不是以新王朝代替旧王朝,而是以新的社会制度代替旧的社会制度。”^③清帝逊位诏书通过这一“大”字,能加深我们对这一历史意义的认识:国号由“大清国”变为“大中华民国”;国体由君主专制变为民主共和。它不是历史上改朝换代意义上的“禅让”给个人,而是在“民军”逼迫要求之下,不得不将剩余政权移交给新生不久的“大中华民国”。至此,“民军”称谓完成了其在辛亥革命时期的历史使命,清帝在逊位诏书中接受“尚为周至”的“民军所开优礼”^④之后宣告“辞位”,“民军”所代表的“中华民国”正式为全国各族南北多方所承认接受。

这里,我们已经读出了“民军”与“大中华民国”的全部含义。

[作者朱文亮,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近代史系博士研究生,北京,102488,ysjaubb@163.com]

(责任编辑:谢维)

· 书 讯 ·

《北洋时期的基层司法》

唐仕春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出版,46万字,89元

此书以北洋时期的基层司法为切入点探讨司法与行政的分立问题。作者用历史学的视角观察法学问题,从时间、空间到结构,全方位呈现了北洋时期基层司法制度的规划、实施和运作;并且从社会学及社会史视角探讨了司法独立理念与共和观念、收回法权运动与政治分立、司法经费与人才,以及诉讼状况等因素在不同的历史情境下如何形成了不同的组合模式,推动或制约着司法与行政的分立。该书着力于在定量分析的基础上重建史事。例如,北洋时期设新式法院的处所有多少?县知事兼理司法占多大比例?政治分立对司法统一冲击的范围有多大?法政毕业生与司法人才的供需矛盾如何发生及变化?有哪些诉讼类别?诉讼的规模有多大?其结案率、结案方式是怎样的?上诉的规模与结果又如何?总之,自清末开始移植西方司法制度后,司法与行政能否分立、如何分立就成了一个始终挥之不去,却又难以解决的问题,而本书对于解决这个问题当有所帮助。

- ① 章开沅、白吉尔编:《辛亥革命史资料新编》第3册,湖北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480页。
- ② 王铁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1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338页。
- ③ 张海鹏:《辛亥革命为中国的进步打开了闸门》,《人民日报》,2011年9月26日,第7版。
- ④ 《宣统政纪》第70卷,宣统三年十二月下,《清实录》第60册,第1294页。